

#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 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

唐 健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国际体系 权力转移 国家模式 战争

**作者简介：**唐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s theory）是由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其1958年出版的专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中首次提出的，后经三代学人近六十年的不懈努力，至今已发展成为持久而富有生命

---

\* 本文是提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2013年12月举办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际问题研究”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感谢高程副研究员、孙学峰副教授、徐进副研究员、周方银研究员在会议上的点评意见；感谢裘援平教授、方长平副教授、Khairy Tourk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意见。同时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

《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63~96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力的研究范式。<sup>①</sup>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有力地论证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什么，即国家不惜为之一战的目标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这导致权力转移理论在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两方面存在问题。对此，本文拟从五个部分加以阐述：第一部分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梳理，并指出其缺陷；第二部分指出现代国际体系塑造了不同模式的国家，它们具有不同的道德、社会和个人特征；第三部分具体论述不同国家模式追求的国家目标，并评估它们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第四部分探讨中国作为崛起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引发中美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 一、文献梳理和问题的提出

任何理论都必须明确规定自己的解释对象和适用条件，权力转移理论也不例外。首先，奥根斯基将人类历史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权力转移理论只适用于工业化阶段，均势理论适用于前工业化阶段，未来的后工业化阶段则期待产生新的国际关系理论。<sup>②</sup>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其次，权力转移理论考察的是大国之间冲突和战争的行为。奥根斯基认为，国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我们所

---

<sup>①</sup> 权力转移理论的三代学者以奥根斯基、杰斯克·库格勒（Jacek Kugler）、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以及罗纳德·塔姆（Ronald L. Tamm）等人为代表，相互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三代学者的代表作分别为：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Ronald L. Tamm,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对于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成为极富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研究范式的评述，参见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 1999, pp. 675-704。

<sup>②</sup>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pp. 351-354. 虽然金（Kim）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联盟转移理论（alliance transitions），并将其适用的历史时期推广至1648年，但这明显违背了奥根斯基的理论意图和他对工业革命影响的判断。参见 Woosang Kim,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 1992, pp. 153-172。

讲的故事是关于国家的传奇”。<sup>①</sup> 主张权力转移论的学者认为，国际社会是等级制的，在这一体系中，主导国（dominant nation）、大国（great powers）、中等国家（middle powers）和小国（small powers）之间的关系呈金字塔结构。在金字塔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其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冲突和战争最容易发生在主导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权力转移理论主要关心的也是它们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最后，国家领导人是理性的行为者。他们会根据国家所面对的实际境况，对自己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再选择合适的手段达到目标。这并不排除有些领导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冒险和赌博，尽管他们的行为也是在预期能得到巨大回报的基础上做出的。<sup>③</sup> 奥根斯基等权力转移论者的上述三项规定也预设了本文的理论前提，框定了本文的解释范围。

均势理论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对手。<sup>④</sup> 均势理论认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均等是保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其他国家，那么其野心也必然随之膨胀。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其他大国会采取结盟的方式以制衡权力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均势理论在理论品性、立论基础和推论方面都存在问题。均势理论试图迅速找到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殊不知，其赖以成立的前提在工业化时代已不成立。具体表现在（1）国家内部固定不变。均势理论认为，均势的实现主要依靠饶有技巧的结盟、领土征服和增强武装力量等。这在18世纪中叶以前确是国际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但在此之后，国际政治发生了质的变化。两大现代因素，即民族主义和工业化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将人口聚集起来，而是使国家领袖掌握了新的巨大资源。工业化进程一旦展开所产生的巨大权势资源也被均势理论忽略，正是英格兰的工厂而非外交使其在19世纪取得了统治地位。（2）国家可以

---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p. 13.

② 道格拉斯·莱姆基在奥根斯基等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重等级制模型，将权力转移理论推广到地区层次，并以中东和非洲为案例对其进行检验，认为权力转移理论也适用于地区关系。参见 Douglas Lemke, “Small States and War: An Expans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 39-40.

④ 在不同的场合，奥根斯基等学者对恐怖均衡（the balance of terror）和集体安全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但由于均势理论一直是国际冲突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范式，所以自始至终都是权力转移理论学者的主要理论对手。对恐怖均衡的分析参见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ter. 13; 对集体安全的分析参见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apter. 1.

随时变换盟友。均势理论另一个潜在预设是国家可以随时根据自身的利益调整盟友，这种看法忽略了意识形态和大众民主政治对国家外交的影响。基于前提的变化，均势理论认为权力均衡带来和平的推论也就不成立了。<sup>①</sup>

与均势理论相反，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等级制会带来和平，国家间权力均等化的过程反而容易导致战争。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国家的权力主要来自内部，包括人口规模、政治体系的效率、经济发展、国民士气(national morale)、资源和地理环境(geography)等六个方面，后来被简化为能够参加工作和参与战斗的人员的数量、经济生产率和政治能力这三个指标。<sup>②</sup>由于国家权势根植于国家内部，所以在现代战争中，即使是战败国，其国家实力也能够在20年的时间内迅速恢复甚至超过战前水平，这被权力转移理论称为“凤凰因素”(phoenix factor)。<sup>③</sup>国家的权力转移要经过三个阶段：潜在权力阶段、权力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sup>④</sup>不同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阶段。率先进入权力增长阶段和权力成熟阶段的国家将获得巨大的权力优势，成为主导国家，建立起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但是，其他国家也会迟早进入权力增长阶段，拥有相当或更大权势基值的国家将成为主导国有力的挑战者。然而权力对比的变化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为此，权力转移理论引入了另一个变量，即挑战者是否对现状满意。<sup>⑤</sup>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主导

<sup>①</sup> 对均势理论的批评参见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ter 12;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apter 1。

<sup>②</sup>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apter 6-8; Ronald L. Tamm,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8-9. 权力转移论者先是用GNP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参见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等等；后来塔姆等学者用GDP取代GNP来测算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一般被定义为政府从人口中提取资源的能力，参见Ronald L. Tamm,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20; 政治能力一般用税收成效(=真实税率/税收能力)来衡量，参见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p. 77。

<sup>③</sup>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apter 3;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art 3; Ronald L. Tamm,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31-32.

<sup>④</sup> 本文遵循奥根斯基对“权力转移”概念的界定，认为“权力转移”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势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用“权力分布变迁”(shif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表示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sup>⑤</sup> “满意”和“不满意”这两个概念太过主观，因此在量化标准的选择和说服力上都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满意变量的引入冲淡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变量，使其理论框架过于富于弹性而降低了解释力。参见高程：《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3期，第4页。

国都是现状满意者，因为之前建立的国际体系对它本身更有利；而崛起国可能会认为国际体系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利益与尊重，因此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可见，权力转移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权力对比、满意程度和冲突可能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①</sup>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成为解释国际冲突与战争非常重要的范式，但这一理论在逻辑和经验上都存在一个问题。在逻辑层面上，权力转移理论大的理论前提是现代工业社会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权力资源，国家权势的增长依赖于其内部的劳动人口数量、经济生产率和政治组织，结盟和领土征服等传统方式已不再重要。既然如此，理性的国家之间争夺的是什么，以至于不惜爆发冲突和战争？对挑战国来说，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和威廉·瑞德（William Reed）曾解释说，它们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因为它们认为，如果对国际体系进行变革，它们将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sup>②</sup>但是这一说法无法得到验证。而且，对于挑战国来说，发动战争的得失明显不成比例。挑战国权势的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主导国，所以，只要它具备起码的战略耐心就能成为新的主导国。那么，它为什么对现状感到不满？权力转移论者认为主导国是现状满意者，因为现有国际体系对它们更有利。但是，斯蒂文·陈（Steven Chan）的研究表明，主导国也可能倾向于改变和重塑国际体系，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面对挑战国的崛起，它们往往会发动预防性战争。<sup>③</sup>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的研究发现，“某个担心失去往日辉煌的国家”倾向于发动战争，如1600～1945年间在多极条件下发生的六次大战，有五次是拥有军事优势的国家发起的。<sup>④</sup>在经验层面上，同样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为什么主导国与某个（些）崛起国爆发了冲突与战争，而与另一个（些）崛起国却能和平相处，有的甚至实现了主导地位的“禅让”？前者如一战时期的英国与德国，二战时期的英美与德日，后者如英美。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或实现权力转移，主导国对它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二战之前德日的崛起受到了英美的猜疑和抵制，最后引发了战争，而它们在二

① Ronald L. Tammen,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26-28.

②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A Comment on de Soysa, Oneal, and Park”,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1998, pp. 511-516.

③ Steven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p. 103-141.

④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战后的崛起却得到了主导国的默许与支持。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崛起国对国际体系所持的态度也可能是不同的？二战之前，德日都试图颠覆国际体系，而二战之后，德日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起码是基本满意。二战前后的国际秩序虽有所差别，但都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什么主导国会表现的更像是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以美国为例，其主导北约东扩、决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宣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与传统主权概念相对立等，都表明它不是一个现状大国。综上所述，权力转移理论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其无法解释主导国和崛起国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什么（国家目标），这些不同的国家目标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冲突和战争，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三个问题。

权力转移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没有处理好体系与单元之间的关系，当然其他解释主导国和崛起国关系的理论也存在着这一缺陷。长周期理论（long cycle theory）和霸权稳定论都认为存在着一定的霸权周期，在经济成本和收益的作用下，霸权国会逐渐走向衰落。崛起国会对现有的统治方式和利益分布感到不满，并力图通过挑战主导国地位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从而引发霸权战争。在这两种理论体系中，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国家目标和互动结果几乎都是给定的。<sup>①</sup> 现实主义理论内部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都假定大国围绕权力而斗争。对权力的欲望或出自国家的求生和拓展本能，或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安全困境决定。在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中，主导国与崛起国将最终陷入武装冲突和恶性竞争。<sup>②</sup> 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试图“找回国内政治”，但由于他们理论体系中的“国内变量”过于碎片化，导致其在整合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时出现困难，因而无法形成简练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

---

<sup>①</sup> George Modelska,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

<sup>②</sup>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框架。<sup>①</sup>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和平论”是目前结合体系和单元层次来解释和预测国家间和平与战争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sup>②</sup>“民主和平论”认为，如果主导国和崛起国同为民主国家，它们就可以规避冲突。但是“民主和平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其意识形态色彩太浓。非民主的崛起国被假定为邪恶、无节制的，是大战的根源；第二，民主和非民主国家的形成、演变和国家目标都是内在决定的，因此，在处理体系与单元关系时仍然有失偏颇；第三，“民主”不能作为划分国家类型的有力标准。有学者称，“民主”这一概念是政治市场上贬值的通货，<sup>③</sup>足以说明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与混乱。“民主”概念的弹性与复杂性使得“民主和平论”能够自我调校而保证适用性。

鉴于现有理论存在的缺陷，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来分析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国家目标、国家目标的形成，以及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冲突和战争这三个问题，在这个解释框架里，系统和单元两个层次必须有机融合。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为实现权力转移，不同的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模式，这决定了它们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的收益以及为此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国家目标以及行为方式的冲突在体系结构和互动的作用下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见图1）。

---

①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参见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even E. Lobell, et al.,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国内学者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介绍参见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134~150页。

② “民主和平论”参见 Dean Babst, “Elective Government: A Force for Peace”, *The Wisconsin Sociologist*, No. 3, 1964, pp. 9-14; Michael Doyle, “Kant's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1983, pp. 205-235;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2, 1997, pp. 267-294。国内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梳理参见倪春纳：《民主能产生和平吗？——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及其回应》，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95~107页。

③ 施密特：《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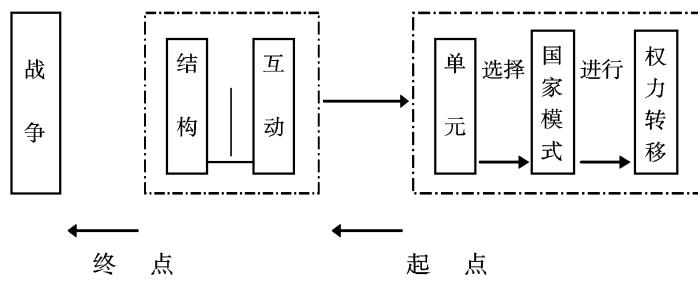


图 1

## 二、国际体系、权力转移与国家模式

国际体系由结构、单元和互动三个要素构成，结构和互动决定了单元的性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将体系划分为系统和单元两个层次，他认为单元和互动都属于单元层次，明确指出在构建国际政治理论时要将单元层次排除出去，强调结构对单元的决定作用。<sup>①</sup>但是，正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指出的，“就任何一个体系的概念而言，互动都是最基本的。没有互动，各部分或诸单位便是分离和独立的”。<sup>②</sup>而且，由于每一个国际体系都有其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因此，单元之间的互动和体系对单元的影响都是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具体而丰富的内容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刺激—反应和空洞的决定论。单元在结构和互动的压力下进行选择，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几乎没有什么人类行为的领域是完全由系统层次决定的……，行为体的选择至关重要，而且这种选择会受到行为体对于系统如何运作的信念的影响。”<sup>③</sup>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彻底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巨大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决定了国家的行动方向和可供选择的菜单。借用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表述，体系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是：“每一生物的构造，都是以最基本的却又往往是隐蔽的方式，与其

①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84~106 页。

②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0 页。

③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 页。

他所有生物体的结构相联系，它为了食物或栖居地而与这些生物体发生竞争，要么不得不逃避，要么则加以捕食。”<sup>①</sup>

权力转移论者习惯于用等级制对国际体系进行定性，在揭示国际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却忽略了该体系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其政治和文化维度），也没有详细揭露主导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现代世界体系始于 16 世纪，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铺陈，劳动分工将世界区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地带。<sup>②</sup> 在经济上，依靠不平等交换，核心地区侵占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市场和资源，造成后者的不发达和依附性发展。<sup>③</sup> 在政治上，核心区的国家不断垄断商品，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再通过激烈的角逐与斗争产生霸权国家；而边缘地区的国家则因为技术和劳动力等原因成为弱国。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核心地区宣称自己是先进文明，具有普世性；而边缘地区的传统文化遭到挤压，被认为是落后、愚昧的文明，边缘国家遭遇身份危机。整个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主导国家在汲取资源、控制边缘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占有显著优势，所以，主导国、大国和边缘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控制、竞争和反抗。

国际体系的等级制结构带来巨大的竞争效应。华尔兹认为，竞争效应将

---

①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 11 页。

② 对核心区的形成、变迁和特征的描述参见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 198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6; 对边缘地区形成、变迁和特征的描述参见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对半边缘地区的描述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pp. 95-118。

③ 不发达理论以弗兰克（A. G. Frank）、阿明等人为代表，代表性著作参见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议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铭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依附理论以卡多索（Henrique Cardoso）、多斯桑托斯等人为代表，代表论著参见 Enzo Faletto and Henrique Cardos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两者的区别在于，依附理论认为，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发展中国家依然能够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畸形和依附于发达国家的。

使国家趋于相同。<sup>①</sup> 然而，由于华尔兹将体系的互动过程从其理论中剔除了，所以他并没有认识到趋同效应并不是绝对的，它最有可能发生在经济技术领域，即器物层面，而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非主导国、特别是边缘国家要想实现权力转移可能需要采用其他形式，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处理好为什么需要国家、如何缔造国家及缔造什么样的国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国家的价值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国家的建构和运作问题。国家的建构和运作以权力的获取和分布为核心，<sup>②</sup> 而等级程度是考察国家权力的有效视角。因此，本文借助戴维·E. 阿普特（David E. Apter）的等级程度和价值类型二分法对国家类型进行分类。等级程度是指测量控制的严格程度，在结构上可以看出权威的集中程度。价值类型是测量终极目的在行动中体现的程度，以最纯粹的“宗教”目的和“世俗”目的为两个极端。<sup>③</sup> 在二分法之下会出现四种国家类型，分别是：A. 神圣—集体模式，B. 世俗—自由模式，C. 可以称为现代化独裁政治或新重商主义社会的威权模式，D. 以神权政治为代表。D模式适用于分析传统社会，其他三种类型适用于分析大多数现代社会。<sup>④</sup> 在现代国际体系，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奉行神圣—集体模式、世俗—自由模式和威权模式的国家脱颖而出，而实行D模式的政治实体（如哈布斯堡帝国）逐渐被淘汰。

选择不同的国家模式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道德（规范）、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sup>⑤</sup> 在三种现代国家类型中，神圣—集体模式和世俗—自由模式对比最为强烈。在神圣—集体模式下，人的行为特点是潜能性，强调人的效率与效能而非人格；其结构性特点是政治社会被看作是将人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手段，因此社会是人们集体生活的关键，强调社会生活而非私人空间，并注重政治的教化功能；其规范性特点是强调整个社会是一个道德伦理

①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99～103页。

② 樊红敏：《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以权力运作为视角》，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第35～41页；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阿普特认为等级和价值这两个指标能够反映出人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以及人们如何感受该社会中的正当性和是非曲直。参见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④ 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第17页。

⑤ 对三种国家模式的分析参见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政治》；对世俗—自由和神圣—集体两种模式的概括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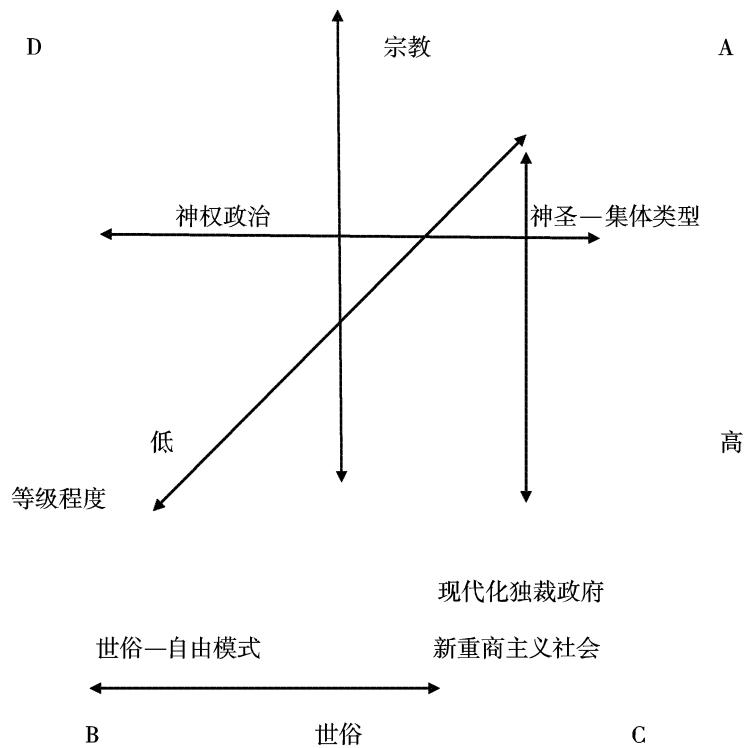


图 2

单位，个人的道德依附于集体的道德。在实践中，这种模式的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来保证人民之间的团结。维系团结的手段是以运动的方式集中精力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国家目标是指向与个人利益相对的集体利益。这类国家通常由一个具有强大感召力和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及群众性的政党组织进行集中而有效的领导。政治领袖高高在上，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要求被统治者予以协作和遵守纪律，这些特定的目标常常是漫无边际的、乌托邦的和神圣的。这类国家更多的依靠意识形态和绩效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在世俗—自由模式下，人的行为特点是普遍具有理性推理能力，拥有认识自我利益的能力；其结构性特点是防止对个人的无理强制和建立有限政府框架，允许人们依凭理性行事，追求自己的利益；其规范性特点是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经典自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世俗—自由模式对应的是自由—功利主义的社会形态，信奉机械的和谐或均衡。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并将政治视为巨大的市场，政府是销售者，政府职位的在任者和候选人积极地制定政策或讨论未来的政策；公民

是购买者，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体现为一人一票的观念。在合法性上，此类国家更多地依靠程序。现代独裁政治很难用一个确切的名词加以定性，权且称其为威权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则包括“基马尔主义”和“新俾斯麦主义”等。威权模式的行为和结构特点与神圣—集体模式类似，在规范上则以世俗目标取代神圣目标，它追求的可能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通常以“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来规范个人和社会生活。

对现代国家模式的划分还应强调两点：一是这三种纯粹的国家模式是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一般都是两种或三种模式兼而有之，不过由于各种模式所占比例不同，国家会更倾向于其中一种；二是三种模式在国际体系的压力下能够发生相互转化。如果神圣—集体模式在国际体系中受挫，神圣目标难以达成，它会向世俗—自由模式或威权模式转变，如苏联在1927年之后由神圣—集体模式转变成威权模式；世俗—自由模式如果在国际体系中受到国际社会不平等对待，无法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资源，它在国内就难以确立自己的权威，从而会向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求助，如魏玛德国转变成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威权模式也可以向世俗—自由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转变，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从威权模式转变成为世俗—自由模式。

世俗—自由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的创新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来提升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实力。<sup>①</sup>而且它最符合现代性开启之后的时代潮流，所以能够得到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支撑。<sup>②</sup>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世俗—自由模式的国家能够有效开展工业化和建立稳定政体，最终完成权力转移。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全球性主导国——英国和美国——都是利用世俗—自由模式实现了权势的爆发式增长。毋庸讳言，英国和美国拥有世俗—自由模式的内生因素，但是，这些内生因素得以凸显出来也是因为它们暗合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国际体系也为英国和美国最终确定世俗—自由模式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对英国来说，百年战争的失败使英国人撤出

<sup>①</sup> 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第27页。

<sup>②</sup> 特洛尔奇在其名著《现代世界》中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知识学的理性主义取代教义神学，人的自律取代超自然的他律，历史相对主义取代绝对的启示真理，世俗的国家理念取代神权国家理念，国家式宽容取代教会式不宽容，冲动的内在世界取代禁欲的彼岸世界，进步的乐观论取代原罪的悲观论”。从其中可以概括出现代性的结构性特征：民族——主权国家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世俗——自然法法律观、意识历史化的知识学以及精神上的个体化。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了欧洲大陆，当它们为了增强国力将目光转向海洋时才获得了“一种新的、被牢固界定的（和独特的）国家人格，从威廉征服时代开始，它就成为像荷兰或西西里王国那样被浅海环绕的国家。现在，政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发生了：她发现了海洋原理这一神赐之物”。<sup>①</sup>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英国能够远离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征伐，因而无需建立专制政府和维持强大陆军而专注于海洋，从而建立了海洋霸权。核心一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国际结构使英国拥有巨大的动力和财富开展工业革命，使得世俗—自由模式在英国最终确立起来。对美国来说，首先，由于英国和其他欧陆诸强的龃龉，其在法国等国家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赢得了独立战争，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战争机器；其次，在没有英国政府干涉的情况下，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摆脱南方的种植园依附型经济，为工业化进程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最后，美国同英国一样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由于大洋和英国海军的庇护，使其免于欧陆诸强的征伐，并且周边国家都不是强国，这为其在国内建立限制性政府和崇尚个人自由的世俗—自由模式创造了条件。

但是，世俗—自由模式对那些面临紧迫赶超任务，尤其是那些仍处于被侵略和殖民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并不适用。首先，世俗—自由模式的内生性因素需要长时间的演化，而且世俗—自由模式无法轻易地建立权威，<sup>③</sup> 因此，对于那些与主导国竞争失败后在外部刺激下进行改革的国家来说，发展该模式缺少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对那些面临着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统一、与传统决裂等紧迫任务的边缘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们还需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构建现代国家意象与民族认同。因此，这些国家需要有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甚至进行革命，最终建立强大国家，实现工业化。其次，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边缘国家采用世俗—自由模式难以与主导国竞争。主导国在资源和技术等各方面都占据着比较优势，采用世

<sup>①</sup>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Ltd, 1963, p. 29.

<sup>②</sup> 正如入江昭所说：“北方坚持自由白人劳力能够发展经济以及对外国制成品实施进口保护的国家观念，而追求农奴制经济、需要自由贸易得到出售棉花的市场并获取廉价消费品的南方却认为，当他们不能再从这个国家联盟中获益时，它就应当解散。……所幸的是，19世纪中叶的欧洲大国基本上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关系，而没有过多地理会美国的事务。”参见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sup>③</sup> 戴维·E. 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第24页。

俗—自由模式的边缘国家会形成依附阶级和依附经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准确地看到了英国正是依靠国家引导的发展登上权势巅峰的，但是“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登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上来。……任何国家如果依靠保护关税和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同它相抗，这个时候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sup>①</sup>最后，世俗—自由模式在理念和实施后果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讲，世俗—自由模式是将市场理性主义延伸到国家治理层面，在理念上假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容易忽视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这一模式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缺失和贯穿世俗—自由模式始终的人的异化问题。<sup>②</sup>运用到国际层面，世俗—自由模式会造成国家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强国对弱国进行剥削和掠夺。

基于上述原因，为了实现权力转移，非主导国，尤其是边缘国家，一般都会求助于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sup>③</sup>这两个模式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使国家权势在短时间内实现急速增长，完成国家的统一并进行工业化。当国家仅仅关注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实力提升时，它更有可能选择威权模式。当国家在寻求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还试图彻底克服现代国际体系和世俗—自由模式在理念和实践上的缺陷，建立民族/种族、阶级、宗教和共同体的乌托邦时，它会选择神圣—集体模式。威权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普鲁士/德国、1927年之后的苏联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德国是欧洲列强中的后发国家，是欧洲大陆均势的牺牲品，被分为若干个小邦，因此只有依靠强大武力和审慎的战略运思才能在欧洲中部建成民族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普鲁士是“国家理由”和“现实政治”的最好操作者，威权模式也就成了统一之后的德国

---

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3～344页；相关内容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倪延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第18、20～21页。

③ 关于政府在后发国家中扮演的角色参见Stephe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Zhao Dingxin and John A. Hall,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Vol. 28, No. 1, 1994, pp. 211-229;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的体制。1927年斯大林正式掌权之后，苏联转变成威权模式国家，对此后苏联的国家品性，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可谓洞若观火：“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出来。它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绝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也不是来源于客观现实。”<sup>①</sup>因此，意识形态不过是苏联领导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托词，而不是行为的依据。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叩关后，日本实际上成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为摆脱这一国际地位，建成现代化强国，日本在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改革下变成了威权模式国家。神圣—集体模式的国家有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18~1927年的苏联、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以及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史学大家保罗·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认为，18世纪“自由放任”的经典国际权势政治和七年战争中法国的失败造就了大革命的根本环境和成因；<sup>②</sup>工业革命的扩展在俄国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且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些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潮富有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国际环境；<sup>③</sup>一战之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是纳粹在德国攫取政权的根本政治和社会环境，希特勒以宗教式的狂热图谋建立一个德意志种族的乌托邦，并以此为蓝本建立国际秩序。

世俗—自由模式也帮助二战之后的日本和联邦德国实现了权力转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前期的发展中拥有了工业化的技术和人口素质，所以它们能够迅速地进行工业化。正如塔姆（Ronald L. Tamm）等人所言：“主导国和其他参与战争的大国能够在战后的下一代人时间里回到它们原来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对于一个发达国家而言，赶上战前发展水平所需的时间不超过20年。”<sup>④</sup>第二，主导国支持、至少是默许它们的发展。对于战后的日本和联邦德国，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等人认为美国对两国的经济援助无关大局，它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其一，美国对两国进行了自由化改造，并确保了两国政局的稳

① 乔治·F·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②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963-1848*, 对该书的介绍参见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版，第27页。

③ Terry Morris and Derrick Murphy, *Europe: 1870-1991*,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2000, pp. 208-210.

④ Ronald L. Tamm,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31-32.

定，而且由美国负责其外部安全。美国对两国的改造使它们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美国化，<sup>①</sup> 这样就使得世俗—自由模式在这两个国家平稳地成长起来；其二，美国准许它们融入由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两国可以利用巨大的市场和资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贸易国的兴起”难以想象。第三，日本和联邦德国都以放弃部分主权的方式换取主导国对自己发展经济的支持。所以说，日本和联邦德国并没有实现全方位的权力转移，而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

### 三、国家目标、国际体系与战争

世俗—自由模式国家追求的目标，是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创建和维持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根据马克·布罗利（Mark R. Brawley）的观点，世俗—自由模式国家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使得它们对自由贸易感兴趣，并希望通过掌握的国际权力为世俗—自由模式提供国际规模的秩序和保护。<sup>②</sup> 借用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的概念，创建和维护开放国际秩序的方式是建立“市民社会的帝国”（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世俗—自由模式国家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公共领域（国家）和私人经济领域（市场），但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更准确地说，“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是政治功能本身与它们分别在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进行分配的区分。这种分配反映了与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占有直接有关的政治功能和那些与更为一般的公共目的有关的政治功能之分离。……经济的区别事实上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区别”。<sup>③</sup> 在“市民社会的帝国”里，开

<sup>①</sup> 以联邦德国为例，1945年之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都出现了美国化。关于联邦德国的教育、电影、文学和建筑等文化领域的美国化，参见 Ralph Willett, *The Americanization of Germany: 1945-1949*, London: Routledge, 1989; 联邦德国工业的美国化参见 Volker R. Berghah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West German Industry: 1945-19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p>②</sup> 马克·布罗利的观点参见 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rk R. Brawley, *Turning Points: Decisions Sha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oronto: Broadview Press, 1998。国内学者对马克·布罗利思想的介绍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和马克·布罗利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5~7页；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学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6页。

<sup>③</sup> 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放的国际秩序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各主权国家完成自己的分工，各国之间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市民社会的帝国”构建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第二，建立和维持开放的国际秩序。在“英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在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英国以“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进行统治，它在英帝国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培植和利用当地精英作为代理人管理殖民地，尽可能少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此更方便英国提取资源增强自身实力，巩固主导地位。<sup>①</sup>所以，英国在主导国际体系的同时仍然在不断地与其他大国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它逐渐走下坡路，开始调控帝国衰落时，才表现出收缩的特征。在国际关系上，英国主导设计的国际秩序“实质是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把其国内的经济体制推广到整个世界”，<sup>②</sup>在自由竞争中击败其他竞争大国。二战之后，国家独立和主权得到更多的强调，美国强行改变他国制度的成本太高，所以它更加注重自己的“软实力”，通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广促进他国社会形态和制度形式的渐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美国虽然对英国自由放任式制度进行了调整与创新，但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维持、扩展和深化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sup>③</sup>

神圣—集体模式国家追求的是自己终极的神圣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它们认为的更崇高的人类理想。这些目标往往以对国际秩序的不满为出发点，所以它们是最激进的修正主义国家。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怀有“弥赛亚式”的激情和使命感，一旦出现权力转移，在它们觉得自己有实力改变外在世界的时候，其对外行为会具有强烈的攻击性，甚至会主动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部进攻受挫或内部虚弱，神圣—集体模式国家就会走向封闭，转向严密的国家内部控制，并通过强化外部威胁来维持民众对神圣目标的认同。以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和1918~1927年的俄国/苏联为例。法国大革命以人民主权论为根本纲领，在击溃外部干涉后迅速转变为意识形态输出以及要对欧洲进行彻底改造，“革命者按照自己无

<sup>①</sup>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 1953, pp. 1-15

<sup>②</sup> 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sup>③</sup> 二战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设计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国界限制的理想重新塑造法国，并欲将这种理想传遍整个欧洲”。<sup>①</sup>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国力极端羸弱，但奉行的却是与其国力不相称的革命外交，它不关注现实的国家利益，反而致力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1917年颁布的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诉诸各交战国的人民而非他们的政府，公开宣布以公开的人民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号召欧洲各大国工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现国际和平和被剥削群众的解放。虽然后来列宁认识到了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实现平衡的必要性，并主导了同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但是，直到斯大林执政后，苏联才真正完全按照政权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推行国策。<sup>②</sup> 希特勒的政治哲学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他认为，历史是人奋斗的历史，奋斗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竞争，为了生存和繁荣，一个人需要足够的领土来支撑其发展。因此，对希特勒来说，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为了胜利，个人应该将自己纳入一个能够动员和集结强大力量的国家之中，而个人的力量来自种族。<sup>③</sup> 因此，在希特勒看来，构成一个国家基础的不是阶级利益，也不是共同体的经济利益，而是种族。鉴于此，德国的首要目标是清除那些削弱和败坏共同体的异己——尤其是犹太人，建立由同一个种族构成的国家。<sup>④</sup> 希特勒的设计是在欧洲大陆建立起帝国之后，在非洲获得大片殖民地，并建设强大的远洋海军，再由他的接班人与美国一决雌雄，取得世界统治权。

威权模式国家没有神圣的终极目标，它们追求的是更实际的利益集团、民族/种族或国家利益。威权模式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后发国家，它们难以与自由模式国家竞争，所以，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势基值，它们倾向

<sup>①</sup> 马丁·怀特著、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sup>②</sup>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意识形态狂热仍然存在。笃信以刺刀输出革命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于1920年获准率军进攻华沙，并期望波兰的工人阶级揭竿而起以响应红军。然而，红军最终大败而归。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鼓吹“不断革命”，并得到季维诺也夫和加米涅夫等领导人的支持，斯大林则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直到1927年斯大林才完全战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尽管保护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的利益也很重要，但是，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从来没有超过他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关注。”参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像》，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sup>③</sup>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87.

<sup>④</sup> Terry Morris and Derrick Murphy, *Europe: 1870-1991*, p. 307.

于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建立排他的实力范围。威权模式国家擅长对现实利益进行权衡。在权势上升时，威权模式国家可能会依靠武力寻求建立封闭的地区秩序，但是如果与主导国实力差距太大或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法实现上述企图时，它反倒可能需要借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增强自身的绩效合法性：即在将内部经济导向国际市场的同时，又要保护本国或地区的新兴工业，使之免于在成熟之前被主导国压垮。如果在竞争中失利或威权模式有被急剧颠覆的危险，它可能会转向封闭甚至建立势力范围。因此，威权模式国家与主导国之间是“封闭秩序”与“开放秩序”的竞争。史蒂文·罗贝尔（Steven E. Lobell）指出，正在衰落的主导国面对自由挑战者（认同和维护开放国际秩序）和帝国挑战者（希望建立排他或自给自足的势力范围）时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前者采取的是适应战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而将更多的战略资源用于压制后者，因此战争往往爆发于主导国和帝国挑战者之间。<sup>①</sup> 俾斯麦在位时，尚能对第二帝国的实力做出准确评估，将注意力专注于国内，但威廉二世上台之后，认为德国的权力转移已经到了能够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开始追求所谓的“世界均势”。德国的“世界均势”不是建立在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开放的国际体系基础之上，而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排他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大战略构思是“在中东欧建立一个资源高度自给自足的庞大的国家集团，它由德国领导，成员包括在经济上与德国联为一体的所有中东欧国家”。<sup>②</sup> 日本在勃兴之后，对外政策上面临的选择是和平扩张主义还是军事帝国主义。所谓和平扩张主义就是仿效白种民族努力从事商业活动，如稻垣满次郎所言，“如果一国希望确立长远的计划和旨在实现富强，就必须力图成为世界工商业中心，因此成为世界政治中心”。<sup>③</sup> 但是，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体系严重病变，促使日本决定性地选择了军事帝国主义。日本的目标是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作战目标是：“削弱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势力的主要基础；占领南亚地区”。日本当时决定要占领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俾

<sup>①</sup> 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5.

<sup>②</sup>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第270页。

<sup>③</sup> 入江昭：《太平洋两岸的疏离》，第35~36页，转引自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第278页。

## □ 当代亚太

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帝汶”。因此可以说，日本是在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sup>①</sup>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目标是维持政权的稳定和消除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威胁，方式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国际利益为准则稳妥地推行战略，以逐步控制欧洲。因此，正如罗贝尔所说，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是“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相冲突的典型表现。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矛盾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希望独占中国东北，而美国则主张该地区的“门户开放”。<sup>②</sup>

表 1 三种国家模式之比较

国家类型 特点	世俗—自由模式	神圣—集体模式	威权模式
代表国家	英国、美国	希特勒德国、苏联（1927 年之前）、毛泽东时期的中国	威廉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日本（1869～1945）
行 为	个人具有推理能力，能够认识和追求自我利益	潜能性，即无人格化的效率与效能	潜能性，强调个人仅仅是集体的一部分
结 构	防止建立强制政府，主张建立有限的政府框架，保证市场和个人自由	政治共同体成为将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工具，因而强调社会生活而非私人空间	强调集体和国家，个人空间服从集体和国家
规 范	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经典自由主义	整个民族/种族、社会和国家成为一个伦理道德单位，个人道德取决于集体道德	强调集体和国家就是价值本身，个人行为为实现集体和国家目标服务
权 威	权威自下而上，虽然能够建立权威，但建立权威的时间比较长，过程不容易	权威自上而下。领袖或统治集团创造权威，并在社会中分配权威	领袖或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分配权威
合 法 性	主要依靠程序合法性，但也有绩效和意识形态合法性	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和绩效合法性	主要依靠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起辅助作用
国家目标	改造他国政治制度；建立开放的国际秩序	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建立能够实现终极神圣目标的秩序	自我封闭；建立排他的势力范围

<sup>①</sup> 日本的战略目标及文章引文参见阿诺德·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8）：1942～1946 年的远东》，郑玉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 页。日本的有限战略目标也体现在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意图上，参见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sup>②</sup> 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p. 21.

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国家目标的相似和差异程度决定了它们之间爆发冲突可能性的大小。工业化之后的两个全球性主导国都是世俗—自由模式，它们占据国际体系等级金字塔的顶端。第一种情况，崛起国是神圣—集体模式，主导国和崛起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大。神圣—集体模式与世俗—自由模式的“市民社会帝国”在根本上背道而驰，前者试图彻底颠覆后者的国际秩序。如英国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英美和1927年之前的苏联、英美和希特勒德国等。第二种情况，崛起国是威权模式国家。如果威权模式国家不试图向外扩张建立排他的实力范围，动摇主导国建立的开放国际秩序，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主导国总是试图推动他国内部制度的变革，并把它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会引起威权模式国家的敌意，增加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威权模式国家试图以武力建立属于自己的排他的势力范围，它可能会遭致主导国的打压，甚至爆发战争。第三种情况，崛起国是世俗—自由模式国家，由于它与主导国的意图一致，它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在适当的时机，它们会结盟共同应对神圣—集体模式或威权模式国家的挑战，甚至主导国会将自己的地位“禅让”给崛起国。

国家模式决定了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以及为此采取的手段，限定了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这只是战争发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系统是由各个行为体的行为驱动的，而这些行为体又是由各自的动机、目标和深思熟虑所推动。不过，局部的可预见的性质或状态，要是复杂的话，所导致的是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因为结果和模式乃是通过互动形成的。”<sup>①</sup> 也就是说，国家模式决定了主导国和崛起国博弈的起点，但却不一定能够决定结局。例如，神圣—集体模式的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没有引发美苏之间的战争；等等。这些都说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互动对战争爆发也具有重要影响。

在等级制中，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实力差距会影响战争的爆发。权力转移论者论证指出，在崛起国的实力达到主导国实力的80%~120%这个区间时，战争最容易爆发。<sup>②</sup> 未达到主导国实力80%的时候，崛起国不敢发动战争；实力超过主导国120%之后，其主导地位已经稳固，战争也就不容易爆发了。

①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第10页。

②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21.

然而，权力转移论者忽略了以下可能：如果崛起国太过弱小，主导国可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sup>①</sup> 如果崛起国实力超过主导国的 120%，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国家可能更有颠覆世俗—自由模式国际秩序的冲动。面对崛起国进行或实现权力转移时，主导国是否能够通过自强战略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对其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sup>②</sup> 如果主导国能够成功地实施自强战略，主导国和崛起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反之，则容易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如果主导国通过实施自强战略，保持了国际结构中较为明显的等级制，那么崛起国——即使是神圣—集体模式国家——在成本收益权衡的逻辑下也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主导国由于拥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因此不会太过急于压制崛起国，从而会有效缓解双方的敌对与冲突。

互动所处的军事、经济和社会环境会影响战争的爆发。首先，核武器的出现使军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虽然权力转移理论者一直试图论证核武器的出现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但正如杰克·利维（Jack Levy）所言，权力转移理论“低估了核武器的威慑效力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这对其解释力构成了严重挑战。<sup>③</sup> 核武器巨大的破坏力使人们认识到，一旦有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考虑到代价的严重性，核武器的出现降低了崛起国以武力挑战主导国的可能性。如果崛起国也掌握了核武器，主导国将不会轻易发动预防性战争。但是核武器无法完全防止战争的发生。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掌握核武器，结果将仍然难以预料。世俗的功利权衡在神圣目标之下价值是极低的，神圣价值能够反转成本收益对比。第二，主导国和崛起国若被第三方卷入冲突，则会导致双方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升级，最终发生核战争。即使在核武器的阴影下，主导国和崛

---

① Steven Chan,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2004, pp. 103-141.

② 对自强战略的分析参见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78~105页；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0页。但是许田波的问题在于她过于强调“因果机制”，将自强战略过多地看成是主体策略选择的结果，她力图通过“因果机制”敞开“种种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性和未经尝试的历史路径”，但她忽略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结构和互动对主体策略选择的限定性影响。应该看到，在具体时间和空间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实施自强战略的空间和策略选择是受严格限制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拥有的可能性是不同的。

③ 杰克·S. 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起国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有可能陷入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其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对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sup>①</sup> 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R. Oneal）的观点影响较大，他们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对于和平非常重要，但不是充分条件。他们将国家模式引入自己的论证中，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才能保证和平。后来，他们将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个要素并列，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和平论”（triangulating peace）。<sup>②</sup> 但是，他们对国家模式的看法过于简单，也没有认识到经济相互依赖会造成国家模式和国家目标的变更。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当危机来临时，世俗—自由模式国家维持开放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会降低，为了摆脱危机，有的国家会转向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因之增大。最后，不同模式的国家相互之间增加社会沟通交流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从而有助于降低敌对的可能性和程度。但是，相互之间的接触也容易导

---

<sup>①</sup> 阐释经济相互依赖有利于和平的代表性著作参见：Solomon W. Polachec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1, 1980, pp. 55-78; Mark J. Gasiorowski and Solomon W. Polacheck, “Conflict and Interdependence: East-West Trade and Linkages in the Era of Déten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6, No. 4, 1982, pp. 709-729; Mark J. Gasiorowsk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om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1, 1986, pp. 23-38;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有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足以解释和保证和平，必须引入其他变量，参见 John R. Oneal, et al., “The Liberal Peace: Interdepende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50-198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11-28;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William Reed,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 1, 2003, pp. 54-71。很多学者对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持保留和批判态度，参见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49;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63-479; Hyung Min Kim and David L. Rousseau,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Half Right (or Half Wrong): New Tests of the ‘Liberal Peace’, 1960-8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5, 2005, pp. 523-543; Omar M. G. Keshk, Rafael Reuveny and Brian M. Pollins, “Trade and Conflict: Proximity, Country Size, and Measur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7, No. 1, 2010, pp. 3-27。

<sup>②</sup>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2, 1997, pp. 267-294;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世俗—自由模式对自己的普遍性确定不疑，因而总是试图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阵营。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是刺激威权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国家生产的重要原因，也会导致它们更加封闭，更加强调外部威胁，其对外行为也会因此更具攻击性。

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直接决定了战争的爆发与否。面对崛起国，按照对其态度由硬到软的顺序排列，主导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战略选择：战争、遏制、<sup>①</sup> 接触、<sup>②</sup> 收买<sup>③</sup> 和“禅让”等。崛起国对主导国及国际秩序采取的战略主要有激进变革和渐进改变两种。如果崛起国采取渐进改变的战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以低姿态和可接受的方式逐渐改变主导国对自己的疑虑，使国际体系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就会为主导国采取接触和收买等战略留下了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如俾斯麦德国实现统一之后开始专注国内事务，同时在国际上克制自己争夺殖民地的冲动，从而使其他大国默许了强大德国的出现。在面对威权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时，主导国要明智地使用“大棒”和“胡萝卜”，如果只强调接触和收买，可能会助长崛起国武力改变现状的冲动；但如果只强调战争和遏制，则会强化崛起国的敌对态度，使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转圜余地，最终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综上所述，可以将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系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现代国际体系下，非主导国要想实现全方位的权力转移，需要借助于威权模式和神圣—集体模式。世俗—自由、威权和神圣—集体模式国家之间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第二，主导国实施自强战略将会有有效避免战争。第三，

① 遏制战略认为，如果对手有长期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在相当大范围内不间断地推行扩张的意图，这时候就需要以非全面战争的方式，阻止对手进一步扩张，削弱对手的扩张能力，并试图使对手最终放弃扩张意图。遏制战略的具体内涵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和解放等。参见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第66～75页。

②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将接触战略定义为：“用非武力方式来消解崛起国家行为中的扩张性因素，其目的在于使这股崛起中的力量能够在全球和地区秩序和平变革的框架下得以行使。”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reface.

③ 收买战略包括主导国主动调整与崛起国的关系，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提高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等。收买战略可以提高主导国的合法性，赢得崛起国的支持。二战后，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收买战略参见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3页。

核武器会有效防止战争的发生，但是如果出现神圣—集体模式，主导国和崛起国依然可能发生战争。当今国际社会进入“大国无战争”<sup>①</sup> 时代是因为神圣—集体模式的普遍消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不会出现。如果资本主义体系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即使是世俗—自由模式也可能会转变成为神圣—集体模式或极端的威权模式。第四，在核时代，主导国和威权模式崛起国之间一般不会爆发战争，但双方可能会因为第三方而卷入冲突，最终升级为战争。第五，在核时代，如果主导国和（威权、神圣—集体模式）崛起国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而又彼此敌对，双方会陷入零和博弈，在国际社会展开恶性竞争。第六，主导国和世俗—自由模式国家不会爆发战争，除非双方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误，使得一方（崛起国可能性更大）转变为威权或神圣—集体模式。

#### 四、国际体系与中美关系

自 19 世纪被强行纳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边缘。晚清知识分子严复起初试图从英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古典自由主义——中寻找实现自由民主的良方，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却使他深感建立强大国家的迫切与必要，他认为，首要之务应是增强国体，使中国不致沦为劣等国家。严复注意到，德意志、俄国和日本都不是依靠自由民主来增强国家权势的，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都是依凭“国家理由”利用政治权威推行改革实现国家强盛的。<sup>②</sup> 1895 年甲午海战失败，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写到：“急今为之，尤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也。”<sup>③</sup> 严复和康有为等人的危机意识反映了现代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冲击：首先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变更，以及中国在其中位置的变化；其次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资本主义经

<sup>①</sup>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6 期，第 6~32 页。

<sup>②</sup>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76 页。

<sup>③</sup> 康有为等：《公车上书》，载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1 页。孔飞力（Philip A. Kuhn）对魏源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首要之务是增强国家权力，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济的影响。因此，重构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的压倒性任务。在重建国家的进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全面胜利，而自由主义政党却失败了。邹谠在探究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分析，自由主义政党成功的前提是存在能够正常运行的政治制度，这样政党之间的分权竞争才能促进渐进的改革，经过较长时间后，积少成多造成社会权力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但是，这对于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来说并不合适，它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急速提升自己的国力，增强民族自信，摆脱贫积弱的地位。<sup>①</sup>

马克思列宁主义建构的神圣—集体模式国家奉行的是“革命外交”。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外交试图以阶级革命路径使得在国内创造新社会的思想与实践在国际政治层面得以延续。虽然考虑到新中国外交的民族主义因素，但是“简单地把毛泽东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的外部世界的事，和他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sup>②</sup>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谱系和思维习惯里，它首先认同的是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之后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利益。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中国革命成功的独特经验，并尽最大可能地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积极援助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新中国革命外交最极端的表现是文革时期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中国的很多驻外领馆被卷入甚至参与到所在国的革命斗争中去。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公开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的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的加强，”“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sup>③</sup> 典型的事件主要包括：20世纪60年代，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大规模援助，结果造成“九三零事件”，并引发印尼严重的排华运动；红卫兵在驻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等大使馆贴大字报组成战斗队，散发红宝书等，引发所在国不满；1967年8月21日，为了声援香港地区罢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的代办处等。即使是

---

<sup>①</sup>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赢得全面胜利的更深入的探讨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

<sup>②</sup> 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63页。

<sup>③</sup>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第72页。

核武器也无法降低神圣—集体模式的进攻性，1957年毛泽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有关核战争的言论可作为佐证：“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sup>①</sup>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打原子弹，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弹，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sup>②</sup> 虽然后来中国掌握了核武器，毛泽东也没有打核大战，但这主要因为毛泽东清楚中国与美苏的实力差距。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及之后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来看，毛泽东不惧怕打核战争。如果当时中国完成权力转移，综合国力达到美苏的80%，结局则将难以预料。

由于神圣—集体模式在提升经济绩效、国家常态治理和处理国家关系上存在诸多缺陷，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再次处于落后地位。但是，因为已基本完成国家内部整合，也无外敌入侵的紧迫危险，所以中国有较为宽裕的时间来进行改革。<sup>③</sup>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由神圣—集体模式进入转型期，国富民强的世俗目标取代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神圣目标。中共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sup>④</sup>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不是通过寻求建立封闭的势力范围来获取自身的发展，而是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开放的国际体系。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开放改革”，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改革，以开放促进改革。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636页。

②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③ 罗伯特·S. 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43页。

④ 陈述：《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策层几乎未经争论就达成了共识，即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萧冬连指出：“中国决策者在改革初期就开始了自觉地系统地考察和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这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走向以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是有着一个广阔的国际经验背景的。”<sup>①</sup>“开放改革”使中国的对外依赖达到了所有大国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中国 2005 年的贸易依存度是 63.9%，远高于美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日本的贸易依存度。中国拥有 5.5 亿人口的沿海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更是高达 95.5%，超过欧盟中英国（54.5%）、法国（51.9%）、德国（71.3%）和意大利（51.6%）等主要经济体。”<sup>②</sup>

中国世俗化的发展目标和开放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它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态度。诸多学者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它将以越来越激烈的方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现有国际秩序。<sup>③</sup> 其实，这些学者都未深入剖析中国的国家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目标的变化。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持的态度可以从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列的两个指标中窥见一斑：一个国家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去挑战国际体系中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一个国家对看似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分配格局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江忆恩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权力格局。<sup>④</sup> 唐世平教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安全战略从毛泽

<sup>①</sup> 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1979~1981）：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9~720 页。

<sup>②</sup> 威廉·W. 凯勒、托马斯·G. 罗斯基：《中国的和平崛起：路线图或者是幻想？》，载威廉·W. 凯勒和托马斯·G. 罗斯基：《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4 页；关于中国发展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参见白若文、托马斯·G. 罗斯基：《中国长期繁荣中的国际因素》，载威廉·W. 凯勒和托马斯·G. 罗斯基：《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第 17~56 页。

<sup>③</sup> 持类似看法的文章参见：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2, No. 1, 1996, pp. 143-164;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2000;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315-342; 等等。

<sup>④</sup>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26~67 页。

东时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变为邓小平及其之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sup>①</sup> 这种解释部分是准确的，从神圣—集体模式步入转型期，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确实离不开学习和社会进化。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国家模式及安全战略的选择是一种“必需”而非进化。正如前文所述，在一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三种国家模式可以相互转化，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在国际结构和互动的作用下，未来中国的国家模式仍然有可能转变为神圣—集体模式或具有排他性的威权模式，安全战略依然有蜕变成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可能。从整个现代国际体系角度看，促使中国采取激进行为的将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爆发的危机。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危机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走向崩溃，中国无法从国际体系中获得支撑自己发展的资源，它可能会采取激进的方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国际结构方面，目前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遥遥领先。虽然中国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直到 2010 年，即使不排除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过占美国的 50% 左右，<sup>②</sup> 远未达到权力转移理论界定的 80% 的警戒线；人均 GDP 占美国比重更低，大约 13% 左右。<sup>③</sup> 在军事领域，中美差距更大。2008 年，美国的防务开支超过了 6000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 800 多亿美元，仅占美国的 14%。在核武器数量上，美国约有 4000 多枚可用的核武器，中国只有不到 180 枚。<sup>④</sup> 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范围，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投送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军与空军远程能力建设才刚刚起步。<sup>⑤</sup> 从这些角度出发，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根本还不存在所谓的权力转移，在安全领域，即使是在东亚，中国也

---

① 唐世平：《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中国安全战略的社会进化论诠释》，载朱峰、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第 109～133 页。

② 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80 页。

③ <http://www.spiegel.de/fotostrecke/graphic-gallery-the-us-and-china-in-numbers-fotostrecke-51314-11.html>.

④ 参见 <http://www.spiegel.de/fotostrecke/graphic-gallery-the-us-and-china-in-numbers-fotostrecke-51314-12.html>.

⑤ 关于美国在军事上处于巨大优势的论断，参见 Stephen G. Brook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2002, pp. 20–33;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2010.

难以撼动美国的主导地位。<sup>①</sup> 更关键的是，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很容易成功实施自强战略。“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人预测经济权力会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信息革命从实质上巩固了美国的经济主导力。……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公开、科学自由、经济开放而富有竞争力——为鼓励革新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sup>②</sup> 因此，在一个实力悬殊的等级制下，中国不可能为了世俗利益挑起战争，“单极结构决定性地减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大国的政策选择”。<sup>③</sup> 从结构角度来讲，能够使中国挑战美国和国际体系的最大可能性来自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遭到惨败，在中心—边缘的国际结构中重新沦为边缘国家，这将导致中国再次步入全面危机，中国可能会回到神圣—集体模式或成为封闭的威权模式国家。

目前中美所处的互动环境有利于避免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中美都是有核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遥遥领先，这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为了世俗利益主动挑起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在中国没有直接以武力圈定势力范围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大可能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核武器的存在促使中美双方尽最大可能地将双方互动维持在良性范围内。2012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突破了 5000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 年，人民币的海外结算量增长了 50%。<sup>④</sup>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结构之间的互补因素正在逐渐减少，而冲突因素正在显现和增加。“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关注自身‘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复兴战略，中美经济领域内的竞争性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质变’，从传统两国关系中的‘稳定器’，逐步转向既合作、但又冲突和竞争的领域。”<sup>⑤</sup>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外交》上刊文指出，中美的趋同将导致两国矛盾和冲突频繁。他认

<sup>①</sup> Robert S. Ross,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Orbis*, Vol. 54, No. 4, 2010, pp. 525–545.

<sup>②</sup> 杰克·S. 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第 11 页。

<sup>③</sup> 朱锋：《中国和平崛起：与单极的关系》，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第 55 页。

<sup>④</sup> Lingling Wei, “ICBC Picked as Yuan-Clearing Bank in Singapor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8, 2012, 转引自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3 期，第 9 页。

<sup>⑤</sup> 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第 9~10 页。

为，在过去 20 年里，中美关系密切是因为双方的理念和发展模式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储蓄为美国消费提供资金。中国公司加工生产由处于后工业化的美国公司设计的产品。中国低调的对外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治国信条着眼于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基于国内自由贸易、国内信贷刺激增长，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稳定。”<sup>①</sup> 因此，中美双方形成了类似于“钥匙和锁”的关系。但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中美发现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健康，两国都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两国在很多方面开始趋同，它们的关系呈现出更多的竞争而非互补的特点。<sup>②</sup> 中美之间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的趋同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这是后发国家的正当权益，也是国际体系竞争的必然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首先美国要降低对核心—边缘国际结构的依赖，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sup>③</sup> 其次，美国应调整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使其能继续包容中国，使中国能获得相应地位和资源支撑自己的发展。

当前中美的战略互动基本上是良性的。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越来越转向亚太地区，相继出台了“再平衡”和 TPP 等战略和制度安排，也有很多学者将美国的举动解读为旨在遏制和围堵中国，但是学界主流观点依然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并非为了全面遏制中国。美国的战略最多是一种“两面下注”，即一方面准备应对中美关系出现最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争取在引导和影响中国的同时寻求两国合作发展。<sup>④</sup> 王帆认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接触加遏制”：“在美国接触与遏制的战略中，两者有效的结合就是合作型施压。原本对立的两种政策——接触与遏制——被统合起来，且与合作和竞争交织的现

---

① Mark Leonard, “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 Growing More Similar Will Pus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ar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3, pp. 125-135.

② 例如，美国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议明显把中国排除在外，其意图是要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制定贸易规则，然后迫使中国接受这些规则。而中国似乎也试图建立没有美国参加的安全和经贸体系，如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在此框架下号召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参见 Mark Leonard, “Why Convergence Breeds Conflict: Growing More Similar Will Pus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art”, pp. 125 -135。

③ 对核心区对边缘区能源、劳动力的依赖参见刘慧、唐健：《生态足迹视角下的生态不平等交换》，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3 期，第 123~132。

④ 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4 期，第 1~7、50 页。

实相吻合。”<sup>①</sup> 从中国方面来讲，采取激进的变革方式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现在的国际秩序不在考虑之内，相反，中国一直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摆脱主导国与崛起国发生冲突的“铁律”。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举行非正式会晤时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有三重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sup>②</sup> 这表明中国无意于建立排他的势力范围，事实上，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越来越持正面看法。<sup>③</sup> 但是，中美战略互动还要避免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战略互疑。由于在国际结构中所处地位、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互疑。王缉思和李侃如意识到了战略互疑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战略互疑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引发带来重大损失的中美政治或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互疑可以使有关中美关系是敌对性质的说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敌对的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基本上都是零和的，并将严重损害相关各方的利益。”<sup>④</sup> 其次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和国家模式的挑战，这很容易使两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带有“圣战”的色彩，影响双方战略选择的空间和灵活性。阿扎尔·盖特（Azar Gat）认为，中国的崛起代表了威权主义大国（Authoritarian Great Powers）的复归。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比二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还要危险，因为它有着比这两个国家大得多的权势基值。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表明其发展模式可以是对美国模式的替代，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影响力。因此，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桥头堡，要抵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在世界的传播。<sup>⑤</sup> 考虑到中国将

① 王帆：《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31～53页。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③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国际秩序所作的表述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上的表述变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七大对国际秩序的表述进一步变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八大的表述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参见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1页。

④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⑤ Azar Gat, “The Return of Authoritarian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No. July/August 2007.

“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视为首要的国家核心利益，<sup>①</sup>可以想见，如果盖特的战略思维在美国政界逐渐占据主流，将对中美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种影响。最后是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中美之间应该不会发生直接对抗，但要避免被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争端中的第三方因素卷入军事冲突。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还要具备足够的战略耐心，避免使自己的行为被美国误读为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越来越具有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趋向，最大限度地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也要改变在中国台湾、钓鱼岛和南海等问题上看似公允实则偏颇的态度，释放明确的信号，管束盟友，避免被拖入中美冲突。

## 五、结语

从根本上讲，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西方经验，它根植于现代西方国家体系向世界拓展的深层逻辑之中。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了世俗—自由模式、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这三种类型的国家。其中，世俗—自由模式在发展经济技术、鼓励创新等方面享有优势，英国和美国也曾凭借此模式成为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性的主导国家。但是，现代国际体系内在的不平等关系使得其他大国和边缘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发展国家经济、与传统决裂以及最终完成权力转移等目标，往往需要借助于神圣—集体模式和威权模式。这三种模式希望从国际体系中得到的收益是不同的：世俗—自由模式希望通过“市民社会的帝国”建立和维持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手段是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和建立开放的国际市场；神圣—集体模式的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敌对态度最为强烈，它希望建立属于民族/种族、阶级和国家的乌托邦。其行为方式也最为激进，如果它正在进行或实现权力转移，它会以武力挑战主导国，而主导国也有强大的动因对它进行预防性战争。威权模式国家以世俗目标取代了神圣目标，这一模式的国家格外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种可能的行为是闭关自守，另一种可能是谋求建立排他的势力范围，

---

<sup>①</sup> 在2009年中美第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时任中国国务委员的戴秉国将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第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参见《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中国新闻网，2009年7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

但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一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

国家模式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这是主导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起点，但却不一定是归宿。它们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还受到国际结构、互动环境和战略选择的影响。本文认为，如果崛起国为神圣—集体模式国家，主导国和崛起国最有可能爆发战争，即使是在核武器存在的情况下，也不排除战争的风险；在核时代，如果崛起国是威权模式和世俗—自由模式，主导国和崛起国一般不会爆发战争，特别是在双方都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除非国际体系出现严重的病变或双方出现重大战略失误。

笔者认为，以 1978 年为拐点，中国开始逐步脱离神圣—集体模式，进入转型期。神圣目标基本被放弃，开始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发展，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国际体系的危机与病变。从根本上讲，工业革命之后主导国与崛起国战争频仍最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如果国际体系遭遇大的经济危机，开放的国际秩序崩溃，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危机与世界危机的共振，重新将中国推向神圣—集体模式。所以需要继续解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核心一边缘结构，进一步削减国际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因素。其次，注意意识形态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美国对自己的世俗—自由模式笃信不疑，正如汉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所言，美国人倾向于赋予自己的外交政策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将政治与道德混合起来，意识形态上的狂热会取代对国家利益的审慎明智的思考。<sup>①</sup>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挑战，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经常扭曲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并由此导致对中国的错误宣传，这反过来又会刺激中国的民族情绪，加深对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敌对。再次，增强中美战略互信。虽然中国和美国已经建立了许多沟通渠道，但双方的战略互疑依然严重，并且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最后，加强对第三方因素的协调管控。中美要在第三方问题上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各自表达主张的同时要密切联系，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因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等问题步入冲突和对抗。

---

<sup>①</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lemma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Hans J.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